



外國藝術家為何鐘情北京城

前些日子，《澳大利亞人報》發表了一篇名為“北京在呼喚”的報道，稱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西方藝術家開始遷徙到北京。60歲的澳大利亞籍印尼華裔藝術家勞倫斯說：“我做了28年的藝術家兼學者，現在想去一個可以盡情施展才情的地方。我不願受桎梏，想去一個開放、包容的地方，北京就是這麼一個地方。”

外國藝術家為何覺得北京是可以盡情施展的地方？不少人從北京的文化、藝術氛圍及國際化程度等角度解釋這種現象，但筆者以為，除了以上原因，外國藝術家之所以選擇北京，或許還出于過慮社會信息的考慮。不久前，《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專欄文章說，常住他國的英國人不會“耳鳴”。作者是一位英國人，住在巴黎已經9年。按說一個英國人住在巴黎會很彆扭，但是這位英國人和那位澳籍印尼華裔說的話幾乎一模一樣，他說：“在巴黎，我的頭腦是自由的。”這看上去有點奇怪，但其實也很好解釋。一個土生土長的英國人，如果生活在英國，他就被包圍在了英國的“信息泡沫”之中——他知道誰是交通大臣，誰是明星，他們有什么醜聞。坐機場巴士時，司機的收音機大聲播放着有關貝克漢姆夫婦的花邊新聞，耳朵里持續響着可怕的鈴音，就像耳鳴一樣，揮之不去。

就這樣，一個英國人來到了巴黎。儘管法國也有法國人的“信息泡沫”，但這個英國人並不知道一位法國名人居住在某個特定地段或曾經上過某個學校，或者哪個法國政客說了什麼、意味着什麼，他不必關心這些，而可以專心地面對自己所想從事的工作。這正如英國作家皮科·耶爾在《全球靈魂》一書中所描述的，不會說日語的他住在日本偏遠鄉村後，不但沒有感到不便，卻感覺到了“解放”——“身處我不能理解的語言環境當中，電視音量再大，我也能睡着，而且從來不會被窗外有關戴安娜之死的閒談所干擾。”

同理，一個澳大利亞籍印尼華裔藝術家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不熟悉紅歌的曲調、聽不懂各種網絡流行語、不知道啥叫“五道杠”、不明白“國情”，微博上的信息泡沫再大，與他一個外國藝術家何干？能夠全心全意地投入藝術創作，這就足夠了。所以，他才說“我不願受桎梏，想去一個開放、包容的地方，北京正是這麼一個地方”。（翟華）

前些日子我探討了些亞裔學生升學的問題，在讀者討論中自然提到了亞裔的“教育風格”的利弊。正好萬維發表一個媽媽和女兒的故事，又引起了子女教育理念的熱議。而最新一期的“大西洋”雜誌發表了一篇子女教育文章“怎樣把你的孩子送進心理診所”（“How to land your kid in therapy”）。這篇文章基本與亞裔教育無關，討論的是美國主流父母的教育理念。但是我讀了之後，卻有“他山之石”的感覺。所以我先放下關於亞裔學生升學的問題，來介紹一下這篇文章和我的感想。

這篇文章的中心內容是批評美國主流的教育理念，即把“快樂”作為中心的教育方法。作者認為，過度地追求孩子的“快樂”，把他們與挫折、壓力等一切“負面情緒”相隔離，反而讓他們長大後感覺不到快樂，而且產生種種心理和人格的問題。作者描述的過于保護、過于放任孩子的父母，雖然與亞裔父母中的“虎媽”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但相信我們都不陌生。我們不妨在此稱之為“貓媽”。但是，讀完全文，我卻感到，“貓媽”、“虎媽”雖然做法不同甚至相反，但在教育理念上卻有着共同的誤區。以下，我們不妨以該文中談到的三個問題來對比一下“貓媽”、“虎媽”的異同。

首先，對於孩子的人格培養是個重要問題。“貓媽”對於孩子過于保護，不讓他有任何負面的經歷，孩子始終有選擇的自由而沒有任何壓力和強迫。“貓媽”既對孩子的成就有很高的期望，又不認為實現這樣的成就需要艱苦的努力。在她看來，“成功”來自於聰明的策略和機會。但事實上，孩子得到很多“選擇”並不能變得更明智，相反卻變得困惑，而且很容易放棄（因為反正還有其他選項）。甚至在簡單的是非問題上，“貓媽”也不是通過阻止和懲罰來傳遞清晰的信息，而是要“交談感受”，挖掘深層原因，避免傷害孩子的情感。這樣的結果是：孩子一直沉浸在“快樂”之中卻喪失了感受“快樂”的能力。他們變得弱不禁風，不能面對現實世界。當然

表弟參加工作後收入不高，但他頭腦靈活，很會過日子，尤其擅長反季節購物。

表弟前些天去商場買了一件名牌羽絨服、一件純羊絨衫、一條加厚牛仔褲，表弟得意地說：“現在是商場夏裝集中上架期，很多男孩子逛商場時都把目光聚集在時尚流行、價格不菲的T恤、襯衣、短褲上，其實這個時候買冬裝可以打四折，如果到了冬天再買同樣的衣服褲子，可就不是這個價了，肯定要多花不少錢。”

表弟也到了戀愛季節，最近他談了一個女朋友曉雯，曉雯是大三學生，學的是文秘專業。那天表弟把曉雯帶到我家里玩，曉雯留着齊耳短髮，素面朝天，背着米奇挎包，穿着淺藍色磨砂牛仔褲，顯得質樸大方。看得出曉雯和表弟感情很好，在飯桌上他們互相夾菜，不時還耳語幾句，真是幸福的一對有情人。

過了一些天我在商場邂逅表弟，他正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直譯應為東方和非洲學院，但俗稱亞非學院。六十年前，作家老舍先生曾在這裡工作過五年，並寫了一篇名為《東方學院》的散文。該院的招生對象有兩類：一是來自亞洲、非洲的學生，向他們灌輸歐洲的有關知識；二是培訓想去亞洲和非洲的歐洲人，向他們講授亞非文化和語言。該院的教學區有一座漂亮的教學樓，2002年9月，我們在亞非學院法律系學習期間，經常在這裏上課。

安排的課程中有一項很特別的內容，叫作“Walk around Legal London”，意思是步行參觀附近的司法機關、律師公會和法學研究機構。這種感性接觸，對於瞭解他們的司法制度有着特別直觀的作用。那天上午，我們在教學樓前集合完畢，學院的x先生帶我們參觀。他說：“我們就從這座教學樓開始吧。”

從教學樓開始？我們感到很奇怪。

他領我們轉到教學樓臨街的一面，指着牆上一人多高的地方，那裡鑄着一塊鐵牌。鐵牌如獎狀大小，紅褐色的鐵銹和磚牆的顏色十分接近，如不留神，還真不易發現。鐵牌上記載的是這座樓房歷史上的一個故事。

此樓建於20世紀80年代。建樓的資金來自一筆善款，因此校方決定要把此樓建得漂漂亮亮，永垂青史。經過名師設計和將近兩年的施工，大樓建成了。果然令人滿意，厚重的高牆、寬大的門窗，既有古典的莊重，又有現代的浪漫，無不顯示着學府的儒雅和知識的滲透。於是校方籌備了隆重的落成慶典，還特別邀請了市長、議員和地方名流前來剪綵。

臘正事兒發生在慶典的前夜。

校方接到一個電話，問建設這座大樓

在為曉雯挑選生日禮物。我笑着說：“曉雯不會打扮自己，也不太懂生活品味，而且現在連收入都沒有，你以前好像不喜歡這種類型的女孩啊！”“表哥，你是有所不知，現在

物價漲了，戀愛的成本也水漲船高，我與曉雯的戀愛應當屬於‘反季節戀愛’。”表弟說。這話把我弄糊塗了，只聽說過反季節購物，哪里有“反季節戀愛”的？表弟接着說：“現在曉雯沒有踏入社會，還帶着學生氣，我和她談這場戀愛不用花很多錢，我爭取曉雯一畢業就和她結婚。”“你為什麼這麼急着要結婚呢？”我不解地問。“道理很簡單，曉雯畢業後進了寫字樓當上了小白

領，自然會打扮、懂生活了，她就猶如一件新上市的時尚服裝，身價跟着漲，到那時我們如果還繼續談戀愛，我的這點工資根本不够戀愛開銷呀！”表弟狡黠地說。（何禮仁）



是否經過了地方政府的批准。

校方答復，當然，我們辦齊了一切手續。

那麼你們得到地主的同意了嗎？對方接着問道。

地主？誰是這兒的地主？

是羅素家族，這兒是羅素家族的私有地皮。你們僅有政府的批件不行，這兒是私人財產，你們沒有徵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

啊？怎麼會是這樣？實在對不起！那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

很簡單，拆掉大樓，恢復原狀。

這怎么可能？明天就要剪綵了，而且有



鑲在牆上的法治精神

很多要人參加。

這是你們的事，與我們無關。

倫敦大學着急了，剛建好的大樓一天沒用，哪能說拆就拆，但是明天的剪綵先取消了吧。

緊接着，校方與羅素家族進行了緊急協商，答應賠償損失。但財大氣粗的羅素家族就是不要錢，只要原來那塊草地。這不是存心過不去嗎？頗有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的倫敦大學堅持保存樓房，不予讓步。互不相讓的雙方終於將糾紛訴之法院。

法院審理認爲，此案法律關係極爲明確，倫敦大學未經土地所有人許可而擅自

候礙事，就被搬走了。你們只把關鍵的幾句話鑲到牆上，讓它與大樓同在就行了。於是這塊小小的鐵牌，在大樓落成典禮上，就被莊嚴地安置在了嶄新的樓牆上。

我湊前細看，那幾句話是：倫敦大學因侵犯羅素先生土地所有權的違法行爲而向他表示痛心的道歉，並對他大公無私熱心助教的高尚品德表示真摯的感謝！

離開倫敦大學的前一天，我帶上相機，專門給這個鐵牌子照了一張相。這個小小的牌子，不正宣示着雖看不見但能讓人實實在在地感到的權利、自由和法治精神嗎？

（作者：李永軍）



“虎媽”絕不會這樣做。相反，“虎媽”往往是忽略孩子的感受，把自己認為“對孩子好”的東西強加給孩子。“虎媽”始終是佔據着主宰的地位，孩子除了服從沒有其他選擇。這種做法，也很不利于健康的人格培養。孩子雖然在學業才藝上成績很大，卻在決策和情感方面不能獨立，以致進入成年之後還要補上“teenage”的“反叛”這一課。所以，“虎媽”、“貓媽”的做法都不利於人格培養。我認為最好的做法，是在尊重孩子的獨立與善於引導之間的平衡。隨着孩子判斷能力的加強而給予他們相應的決定權和責任，為他們步入成年做好準備。

第二，是如何幫助孩子認識現實世界。“貓媽”爲了保護孩子的感受，往往給孩子提供扭曲的反饋。表現不如別人時就說“重在參與”；沒達到目標時就說“享受過程”。成績不好不能說“差勁”，要說“特別”：是學校沒有能照顧孩子而不是孩子不用功。“貓媽”讓孩子沉浸在夸獎之中，每做一件事就換來“好棒、精彩”的掌聲。這種做法的出發點是保護和鼓勵孩子的自信心。但問題是，孩子不是永遠生活在父母編織的保護圈里，享受這個虛幻的自我印象。一旦他們到了真實世界，需要對自己的業績負責，需要面對

挫折和失敗時，他們的自信就會破碎。

甚至有些人只要不持續地聽到讚揚，就會有不安全感。這是“事與願違”的一個典型例子。

而“虎媽”當然不會隨意夸獎孩子，甚至還給孩子設定了太高的標準。但是“虎媽”對孩子在“競爭”中的地位十分敏感，需要經常評估。於是“虎媽”就非常注意孩子生活中那些可以量化的東西，如分數、名次、排名等，用那些來衡量孩子的價值。

這種做法讓孩子認爲人生的成功就在於“成績單”，而對於沒有考試的東西，如個人品質、動手能力、社交能力和生存能力等就可有可無了。而這也是一種對現

實的認知扭曲。我以後的文章還要介紹《紐約時報雜誌》上的一篇文章《紙老虎》，專門講應試教育培養出的亞裔孩子到了社會上的困境。當然，在孩子小的時候，保護他們是應該的。但隨着孩子的長大，我們應該鼓勵他們自己多出去闖蕩，特別是多犯錯誤，因爲這時候的孩子犯錯誤都能得到原諒，而他們自己可以從中學到教訓。而成人後，犯了錯誤後果更嚴重，他們也就越發不敢越過雷池一步。所以，讓孩子早日

在真實世界里“經風雨見世面”，也許比多拿幾個獎杯要重要得多。

這篇文章還尖銳地指出：“貓媽”溺愛孩子表面上是出于“愛心”，實際上很可能是出于父母自己的感情需要。他們太珍惜與孩子的“感情紐帶”而不願意冒任何損害它的風險。特別是父母自己很忙，只有很少時間陪伴孩子時，他們更是樂於沉溺在“你好我好”的氣氛中而不願意面對必要的衝突。他們希望自己在孩子心里是“完美父母”更甚於希望孩子成為“完美成人”。這樣的父母在感情上是如此依賴孩子，以至現在大學在新生報到後都要想方設法才能把父母“趕走”。而“虎媽”的“私心”就更明顯了。“虎媽”們把孩子作爲自己、爲家族爭“面子”的工具。孩子的表現甚至專業、職業的選擇都需要面對“讓我出去如何做人”的問題。還有些父母把自己小時候沒能實現的夢想強加到孩子身上而不顧孩子的興趣和才能的實際情況。當然，我們做父母的很難承認自己有這樣的動機，而是堅持我們做的一切都是“爲了孩子”。但是夜深人靜時自己想一想，恐怕還是有必要的。說到這裏，也許需要一個“免責”聲明：這裏講的“兔媽”、“虎媽”，當然不是白人和亞裔父母的全部，更不是特指母親們。即使是算得上“貓媽”或“虎媽”的人中間，做法也有千變萬化，我上面說的三條不一定都套得上。我這篇文章的目的，只是指出一些常見的理念誤區，供大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不過，關於“虎媽”問題的激烈討論和衆說紛紛，除了反映了大家對子女教育問題的關心以外，還說明這個問題的複雜性。畢竟“虎媽”的行爲模式並非千篇一律，很難用幾個做法來給她們“定性”。而且同樣的做法的正確性也是因人因事而異。而我覺得，從更加本質的“理念”層次上討論，把“虎媽”、“貓媽”這兩極聯繫起來，也許更有普遍意義。希望本文在這個“理念討論”中起到了“拋磚引玉”的作用。

（歐陽峰）